

論
弱
小
民
族

論 弱 小 民 族

全
一
卷

北 社 印 行

1 9 4 0

目次

第一篇

卡爾

論印度

..... 一——一

第二篇

列寧

論弱小民族自決

..... 一六——一九

第三篇

斯大林

東方大學對於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任務

..... 三〇——三七

第四篇

斯大林

論中國·····

三八——六三

第五篇

第三國際綱領

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

六四——八三

第六篇

附錄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

八四——八九

論 印 度

卡爾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九年之間，經常爲紐約每日論壇寫稿，其中有幾篇論到印度。並以印度問題爲基礎，對於帝國主義的發展和殖民地的轉變過程經濟的和政治的理論，做了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的分析。現在譯出來，正當第二次帝國主義混戰，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已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一切弱小民族由此而解放的時候，其重要，不喻而知。「論英國統治印度」發表於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論英國統治印度的將來」發表於一八五三年八月八日——譯者

論 英 國 統 治 印 度

確實地，從維也納來的電報宣示了土耳其、沙丁尼亞和瑞士問題的和平解決。

但昨夜關於印度問題的辯論卻很沉悶地在衆議院繼續舉行。白萊克脫先生 (Mr. Blackett)

以帶有樂觀主義的虛偽的色彩攻擊卻利胡特爵士 (Sir Charles Wood) 和霍格爵士 (Sir Hogg)。很多政府和內閣的辯護人則盡力譴責這種攻擊。終於胡姆先生 (Mr. Hume) 不得不召集各部大臣把議案取消，但辯論卻因此延擱了。

印度是亞洲的意大利；那裏的喜馬拉雅山正如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孟加拉平原正如倫巴底平原，德里正如亞平寧，錫蘭島正如西西里島。二個國家都有同樣豐富的土產和同樣分歧的政治形勢。意大利經常地被侵略者的刺刀逼成爲各種不同的民族，同樣地，我們也可發現印度不是在回教徒，便是在蒙古人或英國人壓迫之下，而分裂爲許多獨立的和互相鬥爭的土洲連小鎮甚至村落也在內。然而從社會的觀點看來，印度便不是東方的意大利而是東方的愛爾蘭。這個意大利和愛爾蘭的奇妙聯繫，一個逸樂世界和憂煩世界的聯繫早已爲自古以來的印度的宗教所預知了。印度的宗教是一個充溢着肉慾主義的宗教，而同時又是一個自求煩惱的制慾主義的宗教；一個林庚式的 (Lingam) 宗教，而同時又是一個甲軋納式的 (Juggernaut) 宗教；一個蒙克的 (Monk) 宗教，同時又是一個白也地的 (Bayadere) 宗教。

我不同意印度有一個黃金時代，因此也決不像卻利胡特爵士一樣相信着庫利坎 (Kuhli-Khan) 時代的權威。只要拿阿倫食白 (Aurung-Zebe) 時代爲例，再不然拿當蒙古人在北部，葡葡

列人在南部的時代，或當回教徒侵入和希伯太師（Hephtharhy）人進佔南部的時代。如果拿再古一點來說，那末婆羅門（Brahman）時神話似的年代，印度的苦難就開始了，那時還在基督紀元以前。

然而，誰也不能懷疑英國所加諸印度的苦難是較所有以前遭受的有其本質上的區別和程度上的厲害。我不必提及歐洲式的剝削制度移殖在亞洲式的之上構成了一個更畸形的聯繫，沙爾塞志（Salsete）廟的任何神聖怪物就會使我們驚動的。這不是英國統治殖民地的特殊形態而且模仿着荷蘭因此爲了敘述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工作只要直截了當地重復英國式的瓜哇總督斯丹福萊富爾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關於過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話就夠了：

「僅僅爲求利所鼓動，荷蘭公司視它的治民比過去西印度的懇殖者視他的家產的一具還要缺少注意和考慮，因爲後者是以金錢買來的，而前者則不會支出分文。因此，荷蘭公司運用所有現存的殘暴機構，利用政治家的實踐過的巧妙和商人的一切獨占的自私心，從人民剝削了極小的生產物和勞動的最後渣滓，而因此，也就增加了一個反覆無常的和半開化的政府的罪惡。」

所有內戰，侵略，叛亂，征服和飢饉雖然是經常的事件奇妙地複雜地，迅速地，和具有毀滅性地發生在印度，但並不深入僅限於表面。英國却破壞了整個的印度社會體系而還沒有任何復興的徵象發現過。舊世更的喪失，沒有得到一個新世界，給與印度人一種特別的憂鬱加上它現有的苦難而向

時使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從其古來的傳統和它的整個的過去歷史分離開來。

自來，亞洲一般的政府只有三部：財政部或對內之分贖機關；軍政部，或對外之分贖機會；最後是公共事業部。

天時和地理條件尤其是廣大的沙漠區從撒哈拉 (Sahara) 延伸到阿剌伯、波斯、印度和韃靼一直至亞洲的最高地使東方農業基礎建築在人工灌溉和給水工程上。如在埃及和印度，洪水的泛濫是有利於使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和其他各地的土壤肥沃，而因此利用灌溉的運河是被提到最高位上。對於水的經濟上和普通用途上的迫切需要，在西方則促使私人專業聯成自動的結合如在法蘭地 (Flanders) 和意大利，但在東方，由於文化程度太低和土地太廣，不足以導向生活上的自動結合，而因此卻妨礙了政府的集權化。於是有一個經濟上的任務歸諸所有亞洲的政府，即從事於公共事業的任務。人工地使土壤肥沃需要一個中央政府，而土壤也會立刻荒蕪由於對灌溉和排水的疏忽。這可表示另一個我們所發現的奇怪事實：整個土地荒蕪了，但以前是很光輝地耕種着的，如巴爾密拉 (Palmyra)、庇忒拉 (Petra)、也門 (Yemen) 的廢墟，和埃及和印度的很多省分。這也表示着一個簡單的破壞戰爭會使一個國家滅絕居民物好幾百年，使它文化消滅。

現在，東印度的英國人從其先驅者接受了財政部和軍政部，但完全忽略了公共事業部。於是農

業的退化不能從事於英國的原則——自由競爭和放任政策。但在亞洲的好多帝國中我們常見到農業敗壞在一個政府之下而復興在另一個政府之下。收穫是依靠着政府的好或壞。正如在歐洲是依靠着季候的好或壞。因此，英着侵略者的壓制和忽略農業並不能視為印度社會的決定破壞力，假如沒有一個十分不同而重要的狀況——一個整個亞洲世界的新紀元。雖然政治形勢是在改變着印度的過去，但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以前，社會條件卻自古以來始終沒有改變。手織機和紡績車有規律地產生了大量的紡織工人。這是那時社會結構的要點。很久以前，歐洲就接受印度的可貴的紡織品，而把貴金屬回報它，供給了印度社會必有的金匠。整個印度社會是狂喜着製飾品，雖是最下等階層，差不多裸着，也還普通地有一副金耳環和掛在項上的金飾品。手指上和足上的金戒也是普遍的。女人和小孩常常佩着很多金或是銀手鐲和踝飾，同時金或銀的神像在房屋內也常可見到。英國侵略者破壞了印度的手織機和紡績車。英國開始以把印度棉花從歐洲市場上驅逐出去，繼之以把紗線輸入印度，最後則以棉花充滿着這棉花的祖國。從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三六年，英國紗線的出口在比例上從一昇到五二〇〇。在一八二四年，英國輸入印度的紗線僅僅一〇〇〇〇〇碼，但在一八三七年便超過六四〇〇〇〇碼了。在同一時間，德于的人口從一五〇〇〇〇人減到二〇〇〇〇人。印度以紡織著名的梭的衰落還不是最不好的結果。英國的蒸汽機和科學在整個印

度上，摧毀了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聯繫。

這裏有二個狀況：一方面像所有東方人一樣，印度人讓中央政府去注意公共事業，這是農業和商業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印度人分散到各處去，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聯繫聚在許多小的中心。這二個狀況，很久以來，便構成一種特殊形態的社會制度——村落制度（Village System）。這使每個這樣的小的中心聯合有獨立的組織和各別的生活。這個制度的特殊形態可以從下面在英國衆議院關於印度事件的官方報告中得到判斷。

「一個村落，在地理上說來，是一個包含幾百或幾千畝可耕的荒蕪的土地的區域，在政治上說來，則像一個團體或市鎮。它有下列正常的官僕人員：普坦爾（Potail）或首民，一般地管理村落事務，仲裁居民爭議，掌管警務，和有收集村內稅捐的責任，他的個人權力，熟悉環境，和對於居民的關切使他最適宜於從事此項責任。寇南（Kunnam）掌管耕種賬目，和登記有關事項。坦萊（Tailier）和都坦（Totie），前者的責任在接受犯罪的報告，和護送居民從一個村落到別個去；後者的本分，則更限制在村落範圍內，在保護收穫，和幫助衡量收穫。邊界員保守村落旁界，或在相關的爭議中供給證據。湖沼和水道管理員分配農業上需要的水。婆羅門教徒掌管村落禮拜。校長教導村落兒童在沙土上讀寫。還有星歷婆羅門教徒或占星家以及其他等。這些官僕一般地構成一個村落的機構，但在審

幾處，範圍比較小，上述的幾個責任的作用有時集中在同一人身上；在另幾處，則人員比上述還要多，在這個簡單的市政廳形式之下，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古便居住着，村落的邊界很少改變，雖然有時會被戰爭、飢饉或疫病所傷害和蹂躪，但同一姓名，同一界限，同一事業，甚至同一家庭會好多年地繼續着。居民對於國家的分裂毫無難色，只要村落整個地存在，他們便不管政權是在轉移或轉移給那個王朝，而內部經濟仍不稍變。普坦爾仍是首民，仍是作爲小法官，仍是村落的稅租收集人。

這些小型的社會組織已經大部解體和不見了，並不十分經由英國收稅人和兵士的殘忍的干涉而只是英國蒸汽機和自由貿易的工作。這些家庭社會是以家業工業爲基礎的，手工紡織和手耕農具使它們能夠自立。英國的干涉使紡工都集中於蘭開夏（Lancashire），使織工都集中於孟加拉（Bengal），以摧毀它們的經濟基礎，解體了這些小的半開化的和半文明的社會。確實地說，這引起了亞洲的最大的，唯一的社會革命。

現在，雖然令人失望，看到無數的勤懇的和無害的社會組織解體，陷入苦海，而個別份子失去了古代文化和傳統的生計方法，但我們必不能忘了，這些田園詩似的村落社會，雖然似乎無害，是東方剝削制度的堅固基礎，約束了人類的思想在最小可能的範圍以內，使它成爲迷信的不可抗拒的傀儡，在傳統慣例之下奴役了它，剝奪了所有偉大的和歷史的創造力。我們也不能忘了這種野蠻的自

大集中在幾個苦難的地區，十足地證明了這個帝國的淪亡，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殘酷的作惡和大市鎮人民的被屠殺；對於這些沒有別個考慮，只有認作是自然之事，正如它本身是全神注意的侵略者的無助的勝利品。我們必不能忘了這種低劣的、刻板的和植物似的生活即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對照之下却引起了野性的、無目標的、無限止的破壞力而使殺人或為印度的宗教儀式。我們也不能忘了這些小社會是沾染了世襲階級和奴隸制度，這逼使人處於從屬的地位而沒有自主的地位，這使本身發展的社會變為永遠不變的自然的天命而因此帶來了殘酷地崇拜自然。這表現在這樣的事實：這個萬物之靈，向海納曼（Manuman）（猴子）和沙阿拉（Sathala）（牛）崇敬而屈膝的確地，英國促使一個印度的社會革命，僅僅為最卑劣的利潤所驅使，而在進行的方式中是相當笨拙的。但這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在於人類除了基本上的革命以外，能否在亞洲的社會狀況之下實行所謂天命？假如不，無論什麼是英國的罪過，她是促使這個革命的歷史上的不知不覺的工具。因而，一個古世界的崩潰的奇觀，雖在我們人類的感覺上不免有所慘痛，但在歷史的觀點上，我們却有權利與哥德同聲一唱：

「這將使我們在苦難中更受苦難

因此增加了我們的更多歡喜，

不會浪費過一萬個魂靈
在鐵木兒的統治之下。」

論英國統治印度的將來

這裏，我想結束我的關於印度的觀察。

英國在印度的無上權威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大蒙古（Great Mogul）的權威是被蒙古大帝（Mogul Viceroys）破壞的，而後者的權威則被瑪哈拉忒斯（Maharattas）所破壞。瑪哈拉忒斯的權威是被阿富汗人（Afghans）所破壞的，而當大家正在互相鬭爭的時候，英國人便趁虛而入，把所有的都壓服下去。一個不僅有着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的而且有着各別種族和世襲階級的國家；一個以大家生來便是互相敵視和排斥為基礎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社會，難道不是侵略者的注定的囊中物嗎？倘若對於印度的過去歷史無所了解，那末也許沒有這樣一個著名的而無可爭辯的事實，即現在英國以印度自身維持的印度軍隊奴役了印度。因而印度決不能逃脫被征服的命運，而印度的整個歷史，假如有的話，就是不斷地被征服的歷史。印度社會可說完全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著名的歷史。我們所說的印度的歷史只是不斷的侵略者建立帝國在這個無抵抗

的和不變的社會上的歷史。所以，問題並不在英國人是否可以征服印度，而是在於我們是否讓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俄羅斯人所征服或是讓英國人所征服。

英國必須在印度執行雙重任務：一個是破壞，另一個是復興。——摧毀了亞洲的古腐社會和在亞洲建立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蒙古人過去不斷地統治着印度，但不久便印度化了。由於歷史的必然法則，這些野蠻的征服者都被他們的治下的優秀文化所征服了。英國征服者是第一個文化比較優秀的，因此也就不會和印度的文化合流。英國人，籍了摧毀印度的原有社會，原有工商業和原有社會的優點，破壞了它的文化。英國人在印度統治的歷史總是關於貧困的記錄。復興工作很少從一連串的毀滅中顯露出來。然而，復興工作已在開始。

第一個復興的表徵是印度的政治上的統一，比大蒙古統治時代還要堅固和廣泛。這個統一在英國刺刀強使之下，將要利用着電報而深入地和廣泛地展開。土著軍隊被英國幹練軍官組織着和訓練着，它們是印度自求解放和解脫外國侵略者的必要前提。活字印刷機第一次被介紹入亞洲社會，這在印度人和歐洲人合作之下，是復興工作新的和有利的工具。連齊明台利（Zemin-darce）和路透華（Ryotwar），雖然復可厭，也陷入對於土地上的私有財產的二種顯然不同的方式——

是亞洲社會的極度需要。印度的土著，勉強的和有限的，在英國督理之下，到加爾各答進學；一個新的學校開辦起來爲了供應政府的需要和學習歐洲的科學。蒸汽機使印度和歐洲保持經常的和迅速的交通使各主要口岸和整個東南洋聯繫起來，而證明了孤立的地位是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不久，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距離因了鐵道和船隻的聯繫，將要縮短到八天，因而這寓言似的國家也將確實地歸併到西方世界了。

英國的統治階級一直到现在，在印度的發展上，還只有意外的和臨時的利潤。貴族要征服它，一般有產者要掠奪它，而大資產者則要傾銷它。但現在，情況是在轉變了。大資產者了解，使印度成爲一個再生產的國家對於他們有極度的需要，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須發展農業灌溉和內部交通。他們計劃着一個印度的鐵道網。他們將要這樣做去。結果必是不可思議的。

很明顯地，印度生產力的落後是由於運輸工具的極度缺乏和各種生產品交換的極度不便。沒有一個地方，除了印度以外，在自然富源之中是這樣地社會化地貧困由於交換工具的缺乏。一八四八年在英國衆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上，這就可證明：「當加地許（Kandehin）的穀價僅每瓜脫（Quater）六先令至八先令的時候，在波納（Hoonah）卻是六十四先令至七十先令。波納的人民都因飢饉而死，得不到一點從加納許來的穀物接濟，因爲泥道是不能應用的。」

鐵道的被引入很容易地有利於農業，由於水溝和河堤的興築以及沿線水的運輸。因而，灌溉，這東方農業的必要前提，可得大大地發展了，同時因缺少水料而發生的飢饉也可免除了。在這個見地上，鐵道的重要性便很明顯，當我們見到被灌溉過的土地，雖在高資（Ghantas）附近，可比未受灌溉的地方付出大過三倍的稅租，供應大過十倍或二十倍的人工，也可產生大過十二倍或十五倍的收穫。

鐵道也有減少軍事設備的數量和費用的作用。華倫上校（Col. Warren）聖威廉堡（Fort St. Williams）的市長，在衆議院的一個特別委員會上報告說：

「收取從遠地來的情報在現今需要幾天甚至幾星期。發去關於軍隊和倉庫的訓令該在比較簡短的時期內完成之。這些應是被非常重視的事情。軍隊能停留在比現在更遼遠和更衛生的兵站上，同時因病而大量死亡也能因此而減少了。倉庫也不必同樣地設立在各站，同時因偶然的氣候變化而敗壞和損失也可避免了。兵士的數量可以依精練的程度的比例而減少。」

我們知道村落社會的市政組織和經濟基礎已在敗壞，但它的最不好的特點，即這個社會的解體爲固定的和不相關連的微點卻在復活。村落的孤立使印度的道路絕跡，而道路的絕跡則更加深村落的孤立。這裏，一個社會存在着僅有低級的交通工具，幾乎和別個村落沒有交往，也沒有對於社

會進步必有的慾望和力量。當英國人破壞了村落的自足的情性，鐵道將供應交通和往來的新的需要。此外，「鐵道制度的效果之一將會使每個受其影響的村落得到這個別的國家的機械和器具的智識，而使印度村落手藝者充分相信它的巧妙而將補償村落的缺點。」（查浦曼（Chappman）印度的棉花和商業。）

我知道英國大資產者給印度以鐵道是抱有低價收購生產用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獨占的目的。但你既把這機械引入一個國家，你便不能制止其發展。你不能在一個廣大國家內維持一個鐵道網不把所有適應鐵道行駛迫切需要的工業引入該國，而因此在和鐵道並不十分有關的工業上也將必就應用着機械。所以，鐵道制度在印度將確實地是現代工業的先驅者。這是更為確切的即印度人是被那英國權威者引導着有適應那完全的勞動的特別才能得到機械的適當知識。這個事實的充分證明就是在加爾各答的造幣廠中，土著工人的智巧和熟練，他們已從事機械工作好多事了，還有在赫德華（Hurdwar）煤礦區內土著工人的從事汽機工作以及別的例子等。坎浦斐先生（Mr. Campbell）雖然他大大地受了東印度公司的偏見的影響，也不得不承認：「印度人有極大的工業能力，很有助於積累資本，同時也著名於精細地清醒的頭腦，和計算的及正確的科學的才能。」他說：「他們的才智是卓越的。」現代工業，從鐵道制度發展而來，破壞了傳統的勞動分工，基於

此的就是對於印度進步和力量的決定妨礙的世襲階級制度。

所有英國布爾喬亞不得不做的事決不會解放人民大眾或提高它們的物質享受。他們依靠着生產力的發展和把人民據爲己有，他們將孜孜從事於奠下這二件事的物質基礎。布爾喬亞會做過更多的事嗎？不通過血蹟和污穢，不通過苦難和無恥，會有過一個進步嗎？

印度人將不會享受英國布爾喬亞播種下的社會新的要素的成果，除非在英國本國，工業無產階級推翻了現今的統治階級，或印度人自己能够堅強完全解脫英國的束縛。關於這些事情，在或遠或近的時間內，我們將能看到這個偉大的和富有興趣的國家的復興。那裏的溫良的居民，雖是最下等的階層，正如沙托考王子（Prince Soltykow）所說的是「較之意大利人更爲精細和能幹。」他們的服從心已是完全被幽靜的高貴所平衡了，雖有着天生的惰性，他們的英勇已使英國官員們震驚了。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文字，我們的宗教的來源。他們彷彿古傑脫（Jat）的日耳曼人和古婆羅門（Brahmin）的希臘人。

在這篇關於印度的論文中，我想說幾句結語。

揭露在我們眼前的是布爾喬亞文化的深深的虛偽和本質上的野蠻已偽裝着可敬的模樣從它的母國無遮欄地轉移到殖民地去了。他們是財產的保護者，但是任何革命的政黨曾組織過一個

土地革命如在孟加拉、馬志拉斯和孟買嗎？引用這個大強盜克立富 (Tod Clive) 的話，他們難道不在印度因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欲而經常從事於殘暴的勒索嗎？當他們在歐洲空談着國債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難道他們沒有在印度沒有勒傑斯 (Rajahs) 在東印度公司的私人投資的紅利和股息嗎？當他們籍着保裝「我們神聖的宗教」與法國革命鬥爭的時候，難道他們同時在印度不禁止宣傳基督教嗎？他們難道從亞立塞 (O. L. S.) 和孟加拉諸廟中去進香的旅客中，在甲革納 (Jaggernaut) 廟中從事於暗殺和賣淫以賺錢嗎？他們都是「財產、秩序、家族、和宗教」中的人物。

英國工業對於一個大如歐洲和有壹萬五千萬畝土地的印度的蹂躪結果是顯著的和可恥的。但我們決不可忘了，現在所建立的是整個生產制度的應有結果。這個生產依存於資本的無上統治。資本的集中對於資本的存在是決定的力量。資本的集中對於世界市場的破壞力，在最大的領域內，顯示了每個文明城市的經濟發展上的必然法則。歷史上布爾喬亞階段必然要建立新世界的物質基礎——一方面是基於人類互相依存和交通工具的國際交通，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和從物質上的生產轉入科學地支配着自然力。布爾喬亞工商業建立了新世界的物質條件，正如地質革命建立了地球表面一樣。當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戰勝了布爾喬亞階段，控制了世界市場和生產力，同時將它們統治於先進人羣之下，那末在人類的進程上，將不會有像那印度人的信異教的偏見：他們不願一飲美酒而願意沈醉于被害者的頭顱。(卡爾)

論弱小民族自決

本文係摘自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七卷)一般地說來,民族自決權總是屬於弱小民族的,而在實際上,本文內論到的俄國少數民族,波蘭,愛爾蘭以及亞洲各民族也都是弱小民族。因此,爲了求這一小冊子內容的統一,我們大膽地把題目改了一下,想也不會和原意有所矛盾的。——編者

要想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所謂自決,自然首先就要提出這個問題。所謂自決是什麼呢?在那些由法權的各種「一般的概念」中得出來的法律定義中去找答案呢?還是在民族運動之歷史的經濟的研究中去找答案?

全世界上，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會與民族運動有聯繫。這種運動的經濟基礎就在於爲要使商品生產完全勝利，就需要由資產階級奪取國內市場，就需要使語言一致的人民的領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妨害這種語言的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言語之統一及順利發展是真正自由的、廣泛的，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週辦的主要條件之一，是人民自由廣泛地團結爲各個階級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最後，又是市場與任何每個大經濟主或小經濟主，賣主及買主發生密切聯繫的條件。

所以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向，就是要組織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的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最深刻的經濟原素推動實現這一點，所以對於整個西歐——而且是對於整個文明世界，資本主義時代標本式的經常的國家，就是民族國家。

所以，要是我們想瞭解民族自決的意義，不去玩弄法律上的定義，不去「捏造」抽象的定義，而去研究民族運動之歷史的經濟條件，那我們就一定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民族自決，就是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外族的集體，就是組織獨立的國家。

毫無疑義的，亞洲（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地方）大部份的領土，或者是「列強」的殖民地，或者

是民族關係上極不獨立和極受壓迫的國家，可是這種人人皆知的情形，又豈能絲毫動搖這一件無庸爭辯的事實：在亞洲本身內，只有在日本，就是說，只有在這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內，才造成了一種使商品生產能夠極充分發展的條件，使資本主義能夠極自由，極廣泛，極迅速發展的條件。這一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因此他自己已開始壓迫其他的民族，束縛殖民地；亞洲是否來得及在資本主義沒有崩潰以前，也像歐洲一樣形成一批獨立的民族國家，這個我們還不得而知。可是，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就是資本主義把亞洲驚醒起來以後，在那裏也各處喚起了民族運動，就是這些運動的趨勢是在亞洲創立一些民族的國家，就是這樣的國家恰巧就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最好的條件。

從民族關係上看來，最適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當然是民族國家。這當然不是說，這樣一種基於資產階級關係的國家，能排除剝削與民族壓迫。這只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種產生力求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之强有力的經濟原素。這只是說，從歷史的經濟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的「民族自決」，只是政治的自決，民族國家的獨立，民族國家的形成，決不能其他的意義。

從馬克思主義的，即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上看來，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贊助「民族國家」這個資產階級民主的要求？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詳細說到。現在，我們只是給「自決」這個概念，下一

個定義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無條件地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一國（例如，講到該國的民族綱題）則還要估計，在同一歷史時代以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的特點。

在西歐大陸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包括有一個十分確定的時期，例如從一七八九起一八七一年止。這個時期恰恰是民族運動及建立民族國家的時期。這時期完結以後，西歐已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而照例是民族統一的國家的成熟系統。因此，誰如果現在還到西歐社會主義者綱領內去找民族自決權，這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初步。

在東歐與亞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是從一九〇五年才開始。俄羅斯、波斯、土耳其及中國等國家的革命。巴爾幹的戰爭——這就是我們的「東方」現時各種世界事變的連環，只有瞎子才不會看見事變的這一個連環，就是許多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運動的掀起，力求造成民族獨立民族統一

的國家之趨向。正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俄國及其鄰邦還處在這一時代，所以我們要在我們的綱領內載入民族自決權這一條。

俄國是有單一的民族中心——大俄羅斯人的中心的一個國家。大俄人佔有整塊大的地盤，人口約有七千萬。這個民族國家的特點：第一是「異族人」（佔人口的大多數——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邊境上；第二是，這些異族人所受的壓迫比在各鄰國（而且不僅是歐洲各國）內要厲害得多；第三是，這些住居邊境的被壓迫民族，它們在邊界之外有許多比較享受民族獨立的同胞（例如，只要記到西南邊界一帶的芬蘭人，瑞典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就夠了）；第四，是本主義的發展及一般的文化水平線，在「異族的」邊境上往往比國家的中心區域高些。最後還有一點，就是在亞洲鄰國內，資產階級革命及民族運動的階段已經開始，這種革命和運動又局部地普及到俄國境內同血統的民族。

如此，正因為俄國民族問題有歷史的具體特點，在我們這裏，在現代承認民族自決權是特別重要的。

在一切民族運動開始的時候，資產階級自然出來做領導者，它把贊助一切民族要求稱爲實際的事情。可是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與其他問題上一樣）的政策，只在一定的方向上贊助資產階級，可是永遠不與資產階級的政策相符合。工人階級只是爲謀民族和平（這是資產階級所不能給的，這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時候才能實現）爲謀平等權利，爲謀階級鬥爭的最好環境，才贊助資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提出民族問題上的原則政策恰恰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實際主義的，它永遠只是有條件地贊助資產階級。一切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都是打算，或者爲自己的民族謀特權，或者爲自己的民族謀特殊利益；這也就是叫做「實際的」東西。無產階級反對一切特權，反對一切特權地位。如果向它要求「實際主義」，即等於上資產階級的圈套使自己陷入機會主義的地位。

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在自己要求的「實際性」的名義之下，將號召無產階級來無條件地擁護它的要求。最實際的莫如說個「是」字，贊成某一個民族的分立，而不是贊成一切與每個民族的分立權。

無產階級反對這樣的實際主義：它承認各民族的平等權，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

等權利時，把各民族無產者間的聯合看得並提得高乎一切，拿工人的階級鬥爭觀點來估計各種民族要求及各種民族分立。實際主義的口號實際上只是純粹襲取資產階級要求的口號。

有人說，你們贊成民族分立權，就是贊成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我們回答道：不，恰巧是在這裏，資產階級就正需要「實際的」解決，而工人則需要在原則上劃清二個趨向。我們在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與壓迫民族奮鬥的程度內，總是最堅決地贊成因為我們是壓迫的最厲害和最堅決的敵人。在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程度內，我們便反對。反對壓迫民族的特權及暴力，同時絲毫不同情被壓迫民族方面謀得特權的企圖。

我們如果不提出和不宜傳民族分立權的口號，那我們就不但是幫助了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而且還幫助了壓迫民族的封建主及專制政體。

被壓迫民族的每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反對壓迫的普通民主主義的內容，正是這一個內容我們無條件地贊助，同時嚴格地辨別那種謀自己的民族特權地位的企圖。

這由資產者及市儈們看來是「不實際的。」可是，這是民族問題唯一實際的，有原則的，真正幫助民主制，促進自由，促進無產階級聯合的政策。

承認一切民族有分立權；估計每一個關於民族分立的具體問題都要從剷除各種不平等，各種特權，及各種特種地位的觀點上出發。

大家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曾認為積極贊助波蘭獨立的要求，是西歐一切民主派，尤其是社會民主派所絕對應該的。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俄國「農民改良」時代，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是唯一的澈底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觀點。當俄國及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的民衆還在沈眠不醒的時候，當這些國內還沒有獨立的羣衆的和民主的運動時，波蘭的貴族解放運動，不但從全俄的，全斯拉夫的民主派看來，就是從全歐民主派看來，都會有偉大的，第一等意義的。

馬克思的這種觀點，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完全對的，但在快到二十世紀的時候就不再是對的了。在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甚至於其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俄國，都掀起

了獨立的民主運動，甚至於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貴族的波蘭消滅了，而讓位於資本主義的波蘭。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波蘭會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識。

要是波蘭社會黨（現在的佛拉克派）在一八九六年企圖把另一時代中馬克思的觀點「緊釘住」那麼，這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的字面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因此，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會起來反對波蘭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熱情，會說明民族問題對於波蘭工人祇有次要的意義，會在波蘭第一次創立純粹無產階級的政黨，會宣佈俄國與波蘭二國工人在階級鬥爭上密切聯合，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是完全對的。

然而，這是否說，「國際」在二十世紀之初，可以認為民族政治自決的原則對於東歐及亞洲是不需要的呢？可以認為它們的分立權是不必要的呢？如果是這樣，那就是最大的謬誤，等於（在理論上）承認土耳其、俄羅斯及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已經完結，等於（實際上）對專制政體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

不，當東歐及亞洲已經開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在民族運動激發及緊張的時代，在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時代，這些政黨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務應當是二方面的一方面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還沒有完成，因為工人民主派是澈底地認真地，誠懇地，不覺

本着自由派的精神，不是本着科什金的精神去堅持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另一方面，主張該國各民族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極緊密地不可分離地聯合起來，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切歷史變動中，在無論資產階級怎樣劃分各單個國家的國界的時候，這個國家內各民族的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都極緊密地不可分離地聯合起來。

馬克思向屬於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問明其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態度怎樣就立刻發現統治民族（英俄）中社會主義者的一個共同缺點：不了解他們對被壓迫民族所擔負的社會主義的義務，再三咀嚼「大列強的」資產階級如傳授與他們的成見。

「空想家」的馬克思竟這樣的「不實際」，主張愛爾蘭分立，而這種分立過了五十年還沒有實現。

馬克思爲什麼採取這個政策？這個政策不是一個錯誤呢？

馬克思開始以爲解放愛爾蘭的不是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運動，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並不把民族運動看做什麼絕對物，明知只有工人階級的勝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

解放。要預先估計到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間的各種可能的對比關係，（這正是使現代俄國民族問題極感困難的地方，）這是不可能的。

可是情形弄成這樣：英國工人階級長久陷於自由派的影響之下，做他的尾巴，因自由派的人政策而喪失自己的頭腦。愛爾蘭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會加強起來而採取革命的形式。馬克思把自己的觀點重新審查而加以糾正。「一個民族要是束縛別個民族，這就是該民族自己的不幸。」愛爾蘭未從英國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以前，英國工人階級是不能得到解放的。英國的反動勢力，是由英國對愛爾蘭的束縛所鞏固和培養起來的。（正如俄國之束縛許多民族也培養它的反動勢力一樣）

馬克思在「國際」中提出同情於「愛爾蘭民族」「愛爾蘭人民」的決議時，宣傳愛爾蘭應與英國分立，「那怕分立以後又會弄到聯邦制。」

馬克思的這種結論，有些什麼理論上的前提嗎？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地早已完成了。可是在愛爾蘭却還沒有完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後，英國自由派的改良才來完成它。如果英國資本主義之被顛覆，有如馬克思最初所預料的那樣快，那末，愛爾蘭就不會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全民族的運動了。不是這種運動既然發生了，馬克思就勸英國工人去贊助它，給以革命的推動，為本身自由

着想而把它進引到底。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愛爾蘭與英國的經濟聯繫，當然比俄國與波蘭及烏克蘭等等的聯繫更要密切些。愛爾蘭與英國的分立，其「不實際性」與「不可實現性」（就以地理上的條件與英國極大的殖民地勢力來說）曾是顯而易見者。馬克思本是聯邦主義之原則上的敵人，他在這次却容許聯邦制，爲的只要使愛爾蘭之解放，不由改良的而由革命的道路，由英國工人階級所贊助的愛爾蘭民衆運動來完成。只有這樣來解決歷史的任務才能最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利益及社會迅速的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

結果却不是這樣。原來愛爾蘭民衆與英國無產階級都很軟弱。只是現在，才由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實行可憐的妥協，用土地改良（實引贖買的）及自治（還沒有實行）來解決（阿爾斯特的例子指明，這是多麼困難）愛爾蘭問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由此就可以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空想家」說他們提出「不可實現的」民族要求，說他們受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小資產階級（芬尼亞的運動，無疑地是小資產階級性的）的影響嗎？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澈底的無產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真正以民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了羣衆，只有這個政策會能使愛爾蘭及英國都不至於將必要的改革

遲延五十年，不至於由自由派爲反動黨力着想而來損傷這種改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做了一個最偉大的，至今還有巨大的實際意義的榜樣，指示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民族運動；警戒他們不要沾染各個國家，各個種色以及各種語言的小資產者所持有的那種「奴隸式的急燥性」；這些小資產者手忙腳亂地認爲誰要是把由某一個民族中的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暴力和特權所造成的國界加以改變，誰就是「空想家」。

愛爾蘭的及英國的無產階級，如果沒採納馬克思的政策，沒把愛爾蘭獨立作爲自己的口號，他們亦犯了最惡劣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忘記了民主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向英國反動勢力及資產階級表示了讓步。

現在來作個總結。

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看來，自決權的問題並不困難。關於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決議的問題，關於自決只能了解爲分立權的問題，關於形成獨立民族國家是一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趨勢的問題，這都沒有嚴重爭論的餘地。

在俄國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與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正在共同奮鬥，而且應當奮鬥堅持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的統一，回擊一切資產階級的及異幫的民族主義的影響——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俄國無產階級負有二重的，或更正確地說，二方面的任務，反對一切民族主義，首先是反對大俄民族主義；不但是一般地承認各民族都有完全的平等權利，而且還承認國家建設方面的平等權利，即在民族自決權，民族分立權；——同時，正爲着各民族的各种民族主義作順利的鬥爭起見，主張無產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鬥爭的統一，主張它們違反着資產階級趨於民族孤立的傾向而極密切地溶合爲國際的共同團體。

民族完全平權，民族有自決之權，各民族工人溶合起來，——馬克思主義，全世界的經驗，和俄國的經驗，把這個民族問題綱領教給工人們。（列寧）

東方大學對於東方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任務

這是斯大林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大學生會議上的演說的一部分。雖然這是十多年以前的東西，但對於殖民地及附屬國家革命的馬列主義的分析並不同時間性的關係而減低價值。當今天帝國主義的統治，壓迫已在大大的動搖而趨向崩決的時候，本文的意義自應重行估計的。——編者

現在來講第二個問題，即關於東方大學對東方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任務的問題。

這些國家生存和發展跟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不同特質是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是在於這些國家都是生存和發展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

第二，在於受兩重壓迫——內部壓迫（本國的資產階級）與外部壓迫（外國帝國主義的資

產階級)加劇和加深了這些國家裏面的革命危機。

第三,是在於這些國家中,有些國家如印度,其資本主義以加强的速度正在生長着,而產生並形成了相當衆多的本地無產階級。

第四,是在於隨着革命運動的高漲,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遂分化成爲兩個部份——即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與妥協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前者仍在繼續着革命的爭鬥,而後者則與帝國主義聯合了。

第五,是在於在這些國家裏面,除了帝國主義的聯合以外,還形成了另一種聯合,即工人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聯合,反帝國主義的聯合,其目的是在從帝國主義之下完全解放出來。

第六,是在於在這些國家內,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從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把民衆解放出來的問題,一天天採取了潑辣的性質。

第七,是在於這種情況大大的促進這些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下列三個結論:

一,要使殖民地與附屬國家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非有勝利的革命不可,無代價的獨立是

得不到的。

二、要推進革命和取得資本主義已發展的殖民地與附屬國家完全的獨立，非使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孤立起來，非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從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非實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非把工人階級中先進的份子組織在獨立的共產黨以內不可。

三、要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內達到鞏固的勝利，非把這些國家的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切實聯合起來不可。

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共產黨人的基本責任，就在於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以這些結論為出發點。跟這些情況相聯繫起來，殖民地和附屬國家革命運動的目的的迫切責任是在什麼地方呢？

現時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特質，就在於已非完全統一而包括一切的殖民地的東方了。從前殖民地的東方是個統一而清一色的東西，現在這種現象已經跟實際不符合了。現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至少有三種：第一種為摩洛哥一類的國家，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工業極不發展；第二種是中國和埃及一類的國家，工業很少發展，僅有比較微少的無產階級；第三種是印度一類的國家，資本主義相當發展，而有相當衆多的民族無產階級。

很明顯的，把這三種國家相提並論是不可能的。

在摩洛哥這樣的國家內，還沒有理由把民族資產階級分爲革命的與妥協的兩派，對於此等國家，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在於採用一切手段，造成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綫。在這些國家裏面，要把共產主義者劃分成統一的政黨，只有在反帝國主義的鬭爭進程中，特別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的勝利以後才可行。

在埃及或中國這類國家內，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協的兩派，但是妥協的一部份資產階級，還不能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而共產黨人又已經不能以成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綫爲自己的目的，因此，在這些國家裏面，共產黨人應該從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進到工人與小資產階級革命聯合的政策。這一聯合，在這些國家內，可以採取統一的政黨，工農政黨的方式，如『國民黨』之類。但在事實上須使這種特殊的政黨，成爲兩種力量的聯合，即共產黨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奮鬥，這就是這一聯合的任務。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如果他不要牽掣共產黨的手足，如果他不妨害共產黨鼓勵和宣傳工作的自由，如果他不要阻撓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如果他可以促進共產黨方面對於革命運動事實上的領導，那末這種政黨是需要的，而且是便宜的。假如他不能保證所有這些條件，那末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就用不着，就不大合宜，因爲他只有使共產主義者溶化在資產階級的隊伍中，使共產黨

失去無產階級軍隊。

至於印度這一類國家的情形，事實就稍有不同。印度這種殖民地生存條件中的根本和新的東西，不僅在於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分裂為革命的與妥協的兩派，而且首先是在於資產階級的妥協派在大體上已與帝國主義妥協成功了。這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對革命的害怕比對帝國主義的害怕還利害，他們對於自己私人利益的關心，比對於自己祖國利益的關心更利害，這一部份資產階級最有錢，最有勢力，他們雙足都是站在革命死敵的營壘以內，而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來反對自己祖國的工農。不破這一聯合休想得到革命的勝利。但是要打破這一聯盟，就須要集中火力，來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揭破他們的賣國行為，把勞動羣衆從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而有系統地準備無產階級領導權所必要的條件。換句話說，問題就在於印度這樣的殖民地內，訓練無產階級去擔負解放運動領袖的作用，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及其搖旗吶喊者從這個榮譽的地位推下來。成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聯合，爭取得無產階級在這一聯合當中的領導權，這就是責任。然這一聯合不可以採取統一的工農政黨的形式，在形式上用統一的綱領束縛起來。在這種國家裏面，共產黨的獨立性，應該是共產主義先進分子的基本口號，因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只有共產黨才能够準備和實行。不過共產黨，爲了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使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孤立起來，自己來領導城市和鄉村

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羣衆，牠儘可以而且應該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派成立公開的聯合。

因此，資本主義已發展的殖民地 and 附屬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迫切任務應該是：

一、奪取工人階級的優秀份子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而成立獨立的共產黨。

二、成立工人農人和革命的智識份子的民族革命的聯合，以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聯合。

三、保證無產階級在這聯合當中的領導權。

四、力謀使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從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

五、保證解放運動與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

攤在東方殖民地 and 附屬國家積極工作者面前的三種迫切責任，就是這樣的。

假如我們就今日國際的形勢來考察這些任務，那末他們都獲得了特別嚴重的性質，和特別重要的意義。現時國際形勢的特徵，乃是業已到來的革命運動暫時沉寂的時期。然而究竟什麼是沉寂，在現時這種沉寂可以表示出什麼意義呢？牠只是表示對西方工人，對東方殖民地，尤其對蘇聯——

各國革命運動的領導——壓迫的加強。不庸置疑的，這種壓迫蘇聯的準備在帝國主義的隊伍中已經開始了。因愛沙尼亞發動而對蘇聯的毀謗運動，因索非亞炸案而對蘇聯的詭計陷害，資產階級報

紙一般對蘇聯的抨擊，所有這些都是向我們進攻的準備階段。這是對輿論的砲兵的預備，爲的藉此訓練居民來猛烈攻擊蘇聯，並造成精神上的干涉前提。這些造謠誣蔑運動的結果如何。帝國主義者採取嚴重的進攻是否冒險，我拭目以俟之。不過這一抨擊，對於殖民地不會生效，這是不庸置疑的。所以，關於革命勢力聯合起來，準備迎擊帝國主義方面可能的侵犯的問題，乃是現時不可避免的問題。

所以，對殖民地和附屬國家革命運動迫切任務的堅決執行，在現時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跟所有這些情況聯繫起來，東方大學關於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使命是在什麼地方呢？這一使命，就在於考慮這些國家革命發展的特點來培養從這些地方來的幹部，以保證以上所解釋的各個不同的迫切任務的完成。

東方大學聽講者約有十種不同的民族班，他們都是從殖民地和附屬國家來到我們這裏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同志都在渴望得着光明和知識。東方大學的任務，就在於從他們當中訓練出真正的革命家，以列甯主義的理論來武裝他們，以列甯主義的實際經驗來供給他們，使他們能够心甘意悅的毫無畏懼的去完成殖民地和附屬國家解放運動的迫切任務。

說到這裏殖民地的東方的積極工作者的實踐中，有兩種傾向，尚須說幾句，要爲了培養真正的革命幹部，便必須與這種傾向作鬥爭。

第一種傾向，就在於把殖民地 and 附屬國家的解放運動的革新的可能性估計的不足，而將包攬一切的民族統一戰線的觀念估計的太高，不顧這些國家的發展的狀況和程度。這是個向右的傾向，它含有降低革命運動和將共產主義份子溶化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一般聲調中的危險。這一傾向鬪爭，乃是東方大學的直接義務。

第二種傾向，就在於把解放運動的革新的可能性估計的太過，而把工人階級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以反對帝國主義一事估計的太低。爪哇的共產黨人，恰好就犯了這種傾向，不久以前，他們對於本國曾經很錯誤地提出了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是向左的傾向，它含有與廣大羣衆脫離和把共產黨變成宗派主義者的危險與這一種傾向作堅決的鬪爭，乃是爲東方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培養真正革命的幹部之必要條件。

大體說來，東方大學對於蘇維埃的東方與殖民地的東方各民族的政治任務，就是如此。

我們希望，東方大學會忠實地能夠去完成這些任務。（斯大林）

論 中 國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中央委員會上演說「國際現狀與蘇聯的國防。」當時，托派反對派正攻擊着第三國際的政策尤其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的演詞雖爲針對着反對派的錯誤而發，但關於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上却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策略的論點。本文係摘自斯氏演說。——譯者

現在來講中國的問題吧。關於反對派對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問題的錯誤，我不想提及了。我所以不想提及，是因爲關於這個問題，已經說得很多，很確實這裏不值得再去重覆了。有人說，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彷彿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託洛茨基）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想提及了。有人說，似乎中國已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是有的話，也沒有甚麼嚴重的意義，因之土地革命在中國，是完全不可避

的（託洛茨基和拉狄克）關於這一點，也不值得再提及了。關於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這些和諸如此類的錯誤，大家從我們的黨的刊物上一定知道的很多了。

現在我們來談列甫主義在解決殖民地及附屬國家革命問題時的基本出發點吧。

共產國際和一般共產黨在處理殖民地及附屬國家革命問題時的出發點是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於把帝國主義國家（即壓迫別國人民的國家）的革命和殖民地及附屬國家（即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的革命，加以嚴格的區別。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是一回事，那裏的資產階級是別國人民的壓迫者，那裏的資產階級在革命的一切階段上都是反革命的，那裏沒有解放鬥爭的要素——民族的要素。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革命，又是一回事，在那裏，別國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乃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裏，這種壓迫不能不撞着民族資產階級，在那裏，民族資產階級，在某一階段上和某一時期內可以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在那裏，民族的要素，解放鬥爭的要素——乃是一個革命的因素。倘若不作這一區別，不了解這個差別，把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和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混為一談——那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翻開了列甫主義的道路，而走上第二國際同道者的道路去了。

列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中，關於這一點曾說道：「甚麼是我們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觀念？是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我們特別着重於這一區別，這是我們和第二國際及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的地方。」（列甯全集二十五卷，三五—頁。）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了解和不承認兩種革命之間的這一區別。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把俄國這個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中國這個被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被迫不得不來反對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等量齊觀了。

在我們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是在反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雖然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爲如此，當時布爾塞維克甚至也不能跟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作臨時的同盟和妥協。反對派以此爲出發，斷定謂在中國，在革命運動的各個階段上，也應當如此，跟民族資產階級暫時的妥協和同盟，不論任何時候和在任何條件之下，在中國都是不能允許的。可是反對派却忘記了，祇有了解和不承認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和壓迫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區別的人，才會這樣說的，祇有放棄列甯主義而投

向第二國際擁護者方面去的人，才會這樣說的。

列甯關於跟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可以成立暫時妥協和同盟一點，說道：

『共產國際應當跟殖民地 and 落後的資產階級民主派訂立暫時的妥協——甚至聯盟，但不要跟他們融合起來，而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甚至在它的初步的形式上。（二十五卷二九〇頁）……我們共產主義者，祇有在這種條件下，就是當這些運動是真正革命的，當運動的代表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來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的時候，才應當而且將要支持殖民地國家中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列甯全集，二十五卷三五三頁，）

列甯在俄國會雷電交作的反對跟資產階級妥協，却又承認在中國可以容許這種妥協和同盟，這是怎麼的呢？也許列甯錯了吧？也許列甯由革命的策略轉到機會主義的策略吧？自然不是的！這所以『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列甯懂得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和壓迫國家的革命間的區別。這所以『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列甯懂得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某一階段上，會支持本國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反對派不願意懂得這一點，他們所以不願意懂得這一點，是因為他們離開了列甯的革命的策略，離開了列甯主義的革命的策略。

反對派的領袖們，在自己的演說中竭力避免列甯的這些指示，害怕撞着了它們，雖然布哈林同志在其報告中還直率地向他們提出了列甯這些指示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種情形呢？爲什麼他們要避開列甯對於殖民地 and 附屬國家的這些人所週知的策略上的指示呢？爲什麼他們害怕這些指示呢？是因爲他們害怕真理。是因爲列甯的策略上的指示推翻了託洛茨基主義對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觀念和政治上的立場。

現在來談談中國革命的各階段吧。反對派混淆黑白，竟否認現在中國革命發展中有任何階段。難道有沒有若干發展階段的革命嗎？難道我們的革命沒有自己發展的幾個階段嗎？即以列甯的四月提綱來說，你也可以看到，列甯曾承認我國革命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其主要軸心爲土地運動；第二個階段是十月革命，其主要軸心爲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中國革命有幾個階段呢？據我看來，它應該有三個：第一個階段是普通的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就是廣州時代，那時革命目標主要是打擊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則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第二個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達到長江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即退出革命，而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爲千百萬農民的強大的革命（今日之中國革命是處在其發展的第三階段上）；第三個階段是蘇維埃革命，這個革命還沒有到來，但是它將到來。誰要是不懂得沒有若干發展階段的革命是不會有的，誰

要是不懂得中國革命在其發展中的三個階段，那他就一點也不懂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懂中國問題。

中國革命第一個階段的特徵是甚麼呢？

中國革命等一個階段的特徵，就是第一，它會是普通的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第二，它的目標主要是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香港罷工等等。）當時廣州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策源地呢？絕對是的，現在祇有瞎子才會否認這的。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應具有這樣的性質，對不對呢？我想是對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和印度革命的補充提綱中，會直爽的說，在這些國家內，「外國的壓迫，仍時時在阻礙着社會生活的發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應該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報告記錄第六〇五頁。）

中國革命的特徵，就在於它已經經過了這個「第一步」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經過了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的時期，而進入第二發展階段，土地革命的時期。

例如，土耳其（凱末爾主義者）革命的特徵，恰恰相反，它是擱淺在發展的「第一步」上，擱淺在第一階段上，擱淺在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階段上，甚至不想轉到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上去，土地革

命的階段上去

國民黨和它的政府本身在革命第一階段上，在廣州時期，曾代表着甚麼呢？當時它代表工人、農民、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當時廣州是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革命的策源地呢？當時支持廣州國民黨的政策，即支持跟帝國主義進行解放鬥爭的政府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當廣州和安哥拉進行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時候，我們對中國的廣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予以幫助對不對呢？我們是對的。我們是對的，我們當時是依着列寧的足跡前進，因為廣州和安哥拉的鬥爭，分散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削弱了和降低了帝國主義，因此便利了世界革命根據地——蘇聯——發展的事業，今日反對派的領袖們，當時跟我們在一起支持廣州和安哥拉，給他們予以相當的援助，對不對呢？是對的，讓任何人去懷疑這吧。

但是怎樣來了解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中跟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呢？這是不是說，共產黨員不應該增強農工反對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應該犧牲自己的獨立性呢？即使是最小限度的即使是一分鐘的，不，決不是這樣的意見。聯合戰線，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就是它不妨礙共產黨去進行自己獨立的政治的和組織的工作，把無產階級組織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喚起農民反對地主，公開地組織工農的革命，以準備無產階級領導的條

件時，才有革命的意義。我想認爲布哈林同志在其報告中根據大家所知道的文獻，業已窮完全全的證明了共產國際正是以這種聯合戰線的概念，來啓示中國共產黨的。

加明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志這裏引證了一件唯一的一九二六年十月拍往上海的電報。該電說，在上海沒有佔領之前，勿增強土地運動。我決不承認這個電報是正確的。我從來不認爲，現在也不認爲我們的中央是會毫無錯誤的。個別的錯誤是常有的，這個電報，無可爭辯的，是錯誤的。可是，第一個電報過了幾個星期之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未經反對派方面的任何意見，即被我們取消了。第二，反對派爲什麼直到現在對這件事沉默不言，爲什麼他們經過九個月之後方記起這個電報，爲什麼他們要將這個電報在九個月前就被我們取消的事實來隱瞞黨呢？因此，有人以爲這個電報會決定了我們領導的路線。這是惡意的造謠中傷。實際上，這是一件個別的技節的電報，絕對不是共產國際路線和我們領導的路線所特有的。我重覆一遍，這從這件電報經過幾星期之後即被許多文件所取消一事上，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件會規定路線，且爲我們領導所絕對特有的。

讓我來把這些文獻引證幾處吧。

道：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即上述電報拍出發一個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議決案中有一段說

「現時形勢的過渡性質乃是它的基本特質，這時無產階級應該在跟資產階級廣大階層同盟的前途和進一步鞏固自己與農民同盟的前途之間，選擇一個前途。倘若無產階級不提出急進的土地綱領來，那末它就不能吸收農民加入革命鬭爭，而要失去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

又說：

「如果民族解放事業不和土地革命一同提出；那末廣東國民政府在革命中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獲得戰勝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勢力的完全勝利。」（參看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議決案。）

這就是真正決定共產國際領導路線的文獻。

非常奇怪的，就是反對派領袖們對於這些衆所週知的共產國際的文獻，一字不提。

我把我於同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摘引一節，不會算是「不客氣吧」，該委員會，自然我也是參加的，它曾起草了七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這篇演說後來印成單行本題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茲引那次演說中的幾段於下：

「我知道：在國民黨員中，甚至在中國共產黨員中，還有人不認為發動農村中的革命是可

能的。他們害怕農民加入革命，會破壞反帝統一戰線。同志們，這是個極重大的錯誤。中國農民加入革命越迅速而澈底，中國反帝統一戰線將越有力而強大。」

又說：

「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員中，還有些同志認為工人改善他們物質和法律地位的罷工是非所願意的，因此他們勸告工人不要罷工。（台下有人高呼：「廣州和上海會有這種情形」）同志們，這是個很大的錯誤。這是對於中國無產階級作用和比重的一個極重的忽視。這是個絕對否定的現象：在提綱中務須指出，假使中國共產黨員不利用現時有利的環境，去幫助工人改善自己物質和法律的地位，即使是用罷工的方法，那就犯了極大的錯誤。不然中國革命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第三件文獻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發表的，那時共產國際正受到中國各城市的攻擊，相信發動工人的鬭爭，定要引起恐慌、失業工廠和作場的關門。該文件中說：

「從城市中退卻和制止工人改善自己生活鬭爭的一般政策是不正確的。在農村裏面必需展開鬭爭，同時並要利用適當的時機，改善工人的物質和法律地位，竭力使工人的鬭爭具有組織性，防止過火和過度突進的行爲。特別要努力的，就是城市中鬭爭的目標是朝向反對大資

產階級，尤其是反對帝國主義者，以便中國小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都儘可能地留在反對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線的範圍以內，我們認爲調解法庭仲裁裁判等制度適宜的，假如在這些機關中，工人階級正確的政策，能得到保障。同時我們認爲有警告必要的，就是反對罷工和工人集會等自由的命令是絕對要不得的。因爲鑒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須有經常的報告。」

第四個文獻是在蔣介石政變前一個半月發表的，其中說：

「必需要加強軍隊中國民黨和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沒有支部或有成立可能的地方都須成立支部；凡成立共產黨支部不可能的地方，須靠祕密的共產黨員的幫助，進行強烈的工作。須要堅持武裝工農的方針，要將各地的農民委員會變爲武裝自衛的眞止權力機關等等。須要使共產黨到處要以下列方式出現：絕不容許自願的半祕密性的政策；共產黨萬不可作阻礙羣衆運動的活動；共產黨不應該隱蔽國民黨右派賣國和反動的政策；爲要揭破他們，必須動員圍繞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周圍的羣衆。」

須要使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者，必須注意：現時中國革命由階級力量的變動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正處在危急關頭，革命的更進一步的勝利，祇有在發展羣衆運動的堅決方針之下，才有可能。不然，革命就要受到極大的危險。所以，指令的執行比任何時期都必要。」

尙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政變前一年，共產國際就警告中國共產黨，向它指示「須使右派退出國民黨或將右派開除。」

共產國際對於殖民地革命第一階段上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這麼理解的，並且還在繼續這樣理解着。

反對派是不是知道這些指導的文獻呢？當然是知道的。爲什麼他們要對這些指導文獻保守緘默呢？因爲他們是爲了吵嘴，而不是爲了求真理。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現在的反對派領袖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和加明涅夫兩位同志，還懂得一點列寧主義，基本上還對中國的革命運動所堅持的政策，與共產國際所施行及列寧同志在提綱中所指示者相同。我是指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共產國際六次全會而言，那時季諾維也夫同志是共產國際的主席，那時他還是個列寧主義者，還沒有投到託洛茨基的營壘中去。所以我提及共產國際六次全會者，是因爲這次全會有一個關於中國革命的議決案，這個議決案是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一致通過的。其中對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對廣州國民黨和廣州國民政府的估計，大體上和共產國際與聯共所作的一樣，可是反對派現在却否認這個估計了。我所以要提及這個議決案者，是因爲季諾維也夫同志當時曾經投票贊成它，中央委員會中，包括託洛茨基，加明涅夫等同志以及現時反對派

的別的領袖們，沒有一人曾提出過異議反對它。

讓我從這個議決案中引證幾段吧。

這個議決案中關於國民黨說道：

「上海和香港兩地中國工人的政治罷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九月）使中國人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急轉直下……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對於國內一切革命民主組織，尤其國民黨和廣州國民政府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給了一個强有力的推動。基本核心和中國共產黨聯盟的國民黨，本身乃是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城市民主派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一切軍事封建的制度，爭採國家獨立和爭取統一的革命民主政權的鬥爭中而以這些階層的共同階級利益為基礎的革命聯盟。」（參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議決案）

因之廣州時期的國民黨，乃是四個階級的聯盟。你們瞧吧！這差不多就是當時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維也夫同志所崇拜的『馬爾丁諾主義。』（有名的孟塞維克派——譯者）

該議決案關於廣州國民政府說道：

「國民黨在廣州所創造的革命政府，已與最廣大的工農及城市民主派羣衆聯繫起來，而

依靠它們，粉碎了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徒（並在廣東省內，實行急進的全部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工作。）因此，廣州政府乃是中國人民爭取獨立鬥爭中的先鋒隊，它可作為該國未來的革命民主建設的模範。（參看同上議決案。）

可知廣州國民黨的政府，乃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它是個革命的政府，不但是革命的，甚至是中國未來的革命民主政府的模範。

該議決案關於工人、農民與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說道：

「爲了對付新的危險，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應發展最廣泛的政治工作，組織羣衆的行動來援助國民革命軍的鬥爭，利用帝國主義者陣營內的內部矛盾，以革命民主組織領導下的最廣大的人民階層（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對抗帝國主義者。」（參看同上議決案）

這樣看來，在殖民地國家內，在殖民地革命的某一階段上跟資產階級的暫時聯盟和妥協，不但可以容許，而且簡直是必要的。

這跟列寧在他關於共產主義者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家內策略的有名的指示中所告訴我們的話，如出一轍，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所可惜的，只是季諾維也夫同志竟然把這忘記了。

該議決案關於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說道：

「曾經暫時結合在國民黨周圍的中國大資產階級的個別階層，最近一年來，已經退出該黨，以致形成國民黨右翼的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公附反對國民黨與勞動羣衆的密切聯盟，主張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並反對廣州政府的革命政策。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一月）對右派的譴責，和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戰鬥聯盟必要的確認，已經加強了國民黨和廣州政府活動之革命傾向，保證了無產階級對國民黨的革命的 support。」（參看同上議決案）

可知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上會成爲嚴重的錯誤。所可惜的，只是曾經舉手贊成這個議決案的季諾維也夫同志，過了個把月便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因爲正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間（經過一個月），季諾維也夫會要求共產黨人立刻退出國民黨的。

該議決案關於中國共產黨中的各種傾向和對跳過革命之國民黨階段的不許可說道：

「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自決，將在反對兩種同樣有害的傾向的鬥爭中發展起來：一是反對右傾的取消主義，此種傾向忽視中國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的任務，主張跟一般的民主的民族運動無形的融合起來；一是反對極端左傾主義此種傾向，力謀跳過革命民主的運動階段，而直

接從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忘掉農民，這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而決定的要素。」（參看同上議決案）

你們瞧吧，所有這一切，都是現在反對派想跳出中國國民黨發展階段，輕視農民運動而立刻跳到蘇維埃方面去的確證。這是很中肯的。

這個議決案季諾維也夫，加明涅夫，託洛茨基等同志是不是知道呢？

應該說是知道的。無論如何，季諾維也夫同志是不能不知道這個議決案的，因為這個議決案，是在他主席之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上通過了的，而且他本人還舉手贊成的。爲什麼現在反對派領袖們要迴避提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機關的這一個議決案呢？爲什麼他們要對這個議決案保守緘默呢？因爲在中國革命的一切問題上，這個議決案會掉轉來反對他們的。因爲這個議決案會顛覆今日的反對派的全部託洛茨基派的立場的。因爲他們已經脫離了共產國際，已經脫離了列寧主義，現在因爲害怕自己的過去，害怕自己的後影，而不得不怯懦地來迴避共產國際六次全會的議決案的。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情形，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吧。

假使第一階段特點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末第二階段特點，則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內部敵人，尤其是封建地主，封建制度。第一階段是不是解決了它的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任務呢？沒有，沒有解決。它把這一任務，是留給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來進行的。它只是對革命的羣衆第一步的反帝國主義的攪動，以便結束自己的路程，將這個事業交給未來。可以說，革命的第二階段也不會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的任務。它對於中國廣大的工農羣衆定製造成進一步的攪動，不過它的所以這麼做，是爲了將這個事業交給中國革命的下一階段，蘇維埃階段去完成的。這是毫不爲奇的。在我國革命的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形，雖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之下。

我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並沒有完完全全解決它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務，而是把這個任務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交給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算完完全全解決了根除封建殘餘的任務，所以，要是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上，不能全部完成土地革命，要是革命的第二階段在推動千百萬農民羣衆，使他們起來反對封建殘餘之後，而把這一事業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蘇維埃階段去最後完成，這一點都不足奇怪的。這祇是中國未來的蘇維埃革命的另一個任務。

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上，革命運動的核心顯然的已由廣州移到武漢與武漢的革命核心並行的，在南京反革命的核心又造成了。這時共產黨人的任務是在什麼地方呢？是在於盡量利用黨，無

產階級（工會）、農民（農會）及一般革命的公開組織。是在於推動武漢的國民黨人向左走，向土地革命的方面走。是在於把武漢的國民黨變為反對反革命鬥爭的中心，變為工農的未來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

這個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事實證明，這個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它以革命進一步發展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工農羣衆。

當時反對派要求立刻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可是這是個冒險主義，是冒險主義的突進，因為立刻成立蘇維埃，在當時是表示跳過左派國民黨的發展階段。為什麼？因為武漢的國民黨曾支持和共產黨人的聯盟，還沒有在廣大的工農羣衆的眼中失掉信用，還沒有揭破自己的真面目，還沒有失掉共產黨階級革命組織的作用。因為在羣衆還沒有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相信這個政府的無用，相信有推翻這個政府的必要的當兒，提出蘇維埃和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那是說向前直衝，脫離羣衆，失去羣衆對自己的支持，因而破壞業已着手的事業。反對派以為，要是他們懂得了武漢國民黨的不可靠，不堅固和不够革命（一切在政治上更有經驗的工作者都不難懂得這一點），那末這足够使羣衆也懂得這一切，足夠以蘇維埃來代替國民黨，而領導羣衆了。不過這是反對派的一個慣常的極左的錯誤，他們往往把自己的意識和理解，當作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意識和理解。反對派要是說黨應該向

前邁進，那是不錯的。這是一個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不遵守這個原則，就沒有也不能有真正的共產黨。不過這只是真理的一部份。全部的真理，就在於黨不僅要向前邁進，而且要領導千百萬羣衆向前邁進，而不領導千百萬羣衆，那是說在事實上是落後於運動，留在運動的尾巴上。向前邁進，脫離後衛，不善於領導後衛，那就是說造成突奔，足以在某一時期破壞羣衆的前進。老實地說，列寧的領導的要素，就在於是先鋒善於領導後衛，先鋒前進時，不與羣衆脫離，然而要使先鋒不與羣衆脫離，要使先鋒能够真正領導千百萬羣衆，就需要有一個決定的條件，即是羣衆本身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相信先鋒指示命令，和口號的正確。反對派的不幸，正在於他們不承認這個簡單的列寧的領導千百萬羣衆的規則，不懂得如果沒有千百萬羣衆的支持，單是一個黨，單是一個先進的集團，是不能夠進行革命的，不懂得革命，歸根結蒂，乃是千百萬勞動羣衆所「幹」的。

我們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雖然曾經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即有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必要，但是爲甚麼我們不提出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踐的口號呢？因爲後方和前線的廣大勞動羣衆，以及蘇維埃本身，還沒有準備把握這個口號，他們還相信臨時政府的革命性。因爲臨時政府對後方和前線的支持還沒有將自己凌辱，而失去自己的信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波格達契也夫派在列寧格勒會提出立刻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

權的口號；列寧爲什末要譏笑他呢？因爲，波格達契也夫的企圖是個危險的向前奔馳！這一奔馳有造成布爾塞維克脫離千百萬工農羣衆之虞。

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波格達契也夫主義，這就是現在戕害我們的託洛茨基反對派的東西。

季諾維也夫會謂我提到波格達契也夫主義，是把今日的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等量齊觀了，當然，這是胡說八道。第一，我在『時事雜誌』一文中，曾有保留的說：『這裏的相似是有條件的』。『我祇是在所有必要的一切保留之下，即如果注意到今日中國的局面與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局面不同時，我才說這種相似的。』第二，如果有人說，在詳述某國革命中的某些傾向和某些錯誤時，萬不可一般地取其別國革命中相似的地方，那是很愚蠢的。難道一國的革命，不能學習別國的革命嗎？即使這些革命不是同一形式的？不然，革命的科學應歸到甚麼地方去呢？季諾維也夫則承認革命科學之可能。列寧於十月革命前一時期，曾經讀實契海才，蔡列吉利，斯却克洞夫等爲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中的『路易勃朗主義』。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請你把列寧的『路易勃朗主義』一文讀一下就會明白，列寧在批述十月革命前某些要人的錯誤時，曾經廣泛地利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相似之點，雖然列寧很明白，法國革命和十月革命不是同一形式的革命。如果可以說，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時期，

契海才的蔡列吉利是「路易·勃朗主義」那麼爲什麼不能說在中國土地革命時期，季諾維也夫和託洛茨基是「波格達契也夫主義」呢？

反對派肯定地說，武漢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但是爲什麼當時季諾維也夫同志却要說對武漢的國民黨，「務須予以各方面的幫助」，以便使它成爲反對中國卡溫涅克門爭的中心呢？爲什麼不是別的地方，正是武漢的轄境，成了土地運動高度發展的中心呢？正是武漢的轄境（湖南，湖北）在本年初會成爲土地運動高度發展的中心，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爲什麼沒有羣衆土地運動的廣州可以叫做「革命的策源地」（託洛茨基語）而轄境內開始了和發展了土地運動的武漢却不能叫做革命運動的中心，「策源地」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對派要求共產黨放棄參加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理由何在呢？難道反對派沒有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主張和「反革命的」武漢國民黨成立聯盟嗎？反對派爲什麼這樣「健忘」和糊塗呢？

反對派幸災樂禍，以爲跟武漢國民黨的聯盟，結果短命，他們並且確定說，共產國際不會警告中國共產黨員，謂武漢國民黨有崩潰之可能。反對派的幸災樂禍，祇是證明了他們政治的破產，這是不用證明的了。就外表看來，反對派以爲在殖民地國家內，跟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一定是永久的。不過祇有把列寧主義喪失盡淨的人，才會這樣想的。倘若在中國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在某一階

段上，要比革命強大些，倘若這些敵對勢力的壓迫，要引起武漢國民黨的向右轉變和中國革命的暫時失敗，那末祇有患失敗主義病的人，才會對這幸災樂禍的。至於反對派謂共產國際不會警告中國共產黨，說武漢國民黨有崩潰的可能，那末這更是充滿現在反對派武器庫的很平常的誹謗之一了。讓我引幾個文獻來駁斥反對派的誹謗罷。

第一個文獻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發表的，其中說：

『現在國民黨對內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在「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和農村委員會」一口號之下，有系統地開展各省，特別是廣東的土地革命。革命和國民黨成功的基礎，就在這裏。在中國建立廣大而強盛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政治軍事軍隊的基礎，就在這裏。在實踐上，沒收土地的口號，在那些有強大土地運動的省份，如湖南，廣東等等，是完全合時的。否則，開展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

現在應該從革命的工農當中開始組織八個或十個師團，以絕對可靠的份子任官長。這將是在前線和後方保衛武漢解除不可靠軍隊的警衛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應該加強後方和部隊中的分化工作，並對廣東的農民游擊隊予以幫助，在該地地主的政權是特別不能夠忍受的。』

第二個文獻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發表的：

『沒有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就要變成不可靠的軍閥們的可憐的玩具。反對過火是應當的，但不要派軍隊去，而應經過農會去執行。我們堅決地主張由下而上的實際上的奪取土地。譚平山出巡的恐懼是有某些根據的。不要脫離農民運動，而應用各種方法去促進它。不然，事情就要弄糟了。』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幾位老領袖，害怕事變，表示動搖，妥協。應當儘可能的從下而上吸收新的工農領袖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他們的勇敢的呼聲，可使老的領袖變成堅決或者會將他們拋擲出去。目前國民黨的機構應當改變。國民黨的上層務須加以刷新，而補充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來的新的領袖，並應利用工會和農會中的千百萬會員擴大範圍。不然，國民黨就有脫離實際生活，喪失一切威信的危險。

應當消滅對不可靠的軍閥的依賴。應動員兩萬年青共產黨員，加上五萬湖南湖北的革命的工農，組織幾個新的軍團，利用軍官學校的學生做官長，及時組織自己的可靠的軍隊。不然，就不能擔保不失敗。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應組織革命軍事法庭，以非共產黨員的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領袖。處罰與南京保持聯系或勢

唆軍民、工農互相殘殺的軍官。光是勸告是不够的。應立即開始行動了。應該懲罰惡漢。假使國民黨人不學做革命的雅谷賓黨人，那他們對於人民，對於革命都要滅亡的。」

瞧吧，共產國際曾預先看到了事變，它時時放出危險的警號，警告中國共產黨員：倘若國民黨人不能做革命的雅谷賓黨人，武漢國民黨就會滅亡的。

加明涅夫同志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共產國際的政策應該負責的，並謂我們「培植了的中國卡溫涅克派。同志們，祇有甘心叛黨的人，才會這樣說我們的黨的。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即俄國卡溫涅克派登台的時候，孟塞維克就是這麼來說布爾塞維克的。列寧在其「關於口號」一文中寫道，七月的失敗是「卡溫涅克派的勝利。」當時孟塞維克幸災樂禍地說，俄國卡溫涅克派的出現，是由列寧的政策應該負責的。加明涅夫同志是否想過在俄國卡溫涅克派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的出現，是列寧的政策，我黨的政策應該負責的，而不在別人？加明涅夫同志在這個場合之下，配不配模仿孟塞維克紳士們呢？（哄笑。）我未曾想過，反對派中的同志們竟會弄得這麼卑劣……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失敗了，而且這次失敗，比現時中國革命的失敗，更為深刻。孟塞維克當時曾說，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是由布爾塞維克極端革命的策略應負責任的。加明涅夫同志不是在這裏想模仿孟塞維克解釋我國革命史的榜樣來打擊布爾塞維克呢？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

國的失敗是用什麼來解釋呢？原因也許用列寧的政策，而不用階級力量的對比來解釋罷？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失敗是用什麼來解釋呢？也許用共產國際的政策，而不是用階級力量的對比來解釋罷？怎麼能夠說：一個黨的策略可以改變或顛倒階級力量的對比呢？我們在一九〇五年的政策是否正確呢？當時為什麼我們會失敗呢？難道事實沒有告訴我們說：在反對派的政策之下，中國革命比實際上更要失敗得快嗎？凡忘掉革命期間階級力量的對比而企圖僅用某黨的策略來解釋一切的人，怎樣稱呼他呢？關於此種人，只能說一句話，就是他們脫離了馬克思主義。

作幾句結論吧，反對派的主要的錯誤如下：

第一，反對派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

第二，反對派沒有看見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區別。

第三，反對派完全放棄了列寧在革命第一階段上對殖民地國家民族資產階級的策略。

第四，反對派不懂得共產黨參加國民黨的問題。

第五，反對派違犯了列寧對於先鋒（黨）和後衛（幾百萬的勞動羣衆）之間相互關係一問題的策略的基礎。

第六，反對派完全放棄共產國際六次和七次全會的議決案了。

反對派竭力頌揚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政策，說，這個政策倘被採用，中國現時的情形也許要好些了。在反對派所犯的這些重大的錯誤之下，倘若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反對派的反列寧主義的冒險主義的政策，那也許完全走入絕路了，這是不用證明的。中國共產黨在一個很短的期間，既由二千人的一个小集團，增長而為一個有六萬黨員的羣衆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期間既成功將三百萬無產者組織到工會中來，中國共產黨既能成功喚醒了千百萬昏睡中的農民，吸收了成千成萬的農民加入革命的農民協會；中國共產黨既成功在這個期間募集國民革命軍中的十幾團和幾師到自已方面來；中國共產黨既成功在這個期間將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觀念由願望變成事實，總之，中國共產黨既成功在一個很短的期間獲得了這一切勝利，那末這原因正是因為它依了列寧所指示的道路，依了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道路前進的原故。

不用說，在反對派的政策之下，在他們的錯誤之下，在他們的對殖民地革命問題的反列寧主義的方針之下，中國革命的這些勝利，不是一無所得，便是得到的很少。

祇有超左的變節者和冒險主義者，才會對這一點懷疑的。（斯大林）

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

今天，在世界革命的意義上，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已提到最高位上，中國的革命實踐，就是它的發展中的一環。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世界大會通過的第三國際綱領，關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有明確的規定，現在全部譯出，想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

分三部分：

- (一)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 (二) 無產階級專政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 (三) 國際的戰略與策略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譯者）
- (一)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主要的是「自由競爭」的時代，一個資本主義相對地平穩發展和擴延到

全世界的時代，當時尚未被佔領的殖民地正在被分割着和被軍事力量征服着；一個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矛盾不斷地生長着的時代，這矛盾的厄運主要地落在被瓜分的，征服的，壓迫的，殖民地範圍內。

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時代代替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壟斷地互相衝突地發展着；自由競爭急轉直下地變成獨佔。先前「可利用的」殖民地都已被分割完畢，而爲重新分割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的鬥爭必然地首先以武裝鬥爭的形式出現。

在帝國主義時代，複雜的機械，化學和電力是被日見增長地應用着；資本的有機組成更被提高着；利潤率因之而起的低落更進一步地加強了對於殖民地超額利潤的剝削和重新分割世界的鬭爭，雖然利潤率的低落在僅僅最大的獨佔組合能一時地因了卡特爾的高價政策而免除。標準化的大量生產需要更多的國外市場。原料和燃料不斷增長的需要加劇了對於來源的爭奪。最後，高度的保護貿易制度阻礙了商品的輸出而使輸出的資本得到加多的利潤因而也是鼓勵着資本的輸出。因此，資本的輸出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各地經濟關係的最後的和特殊的方式。總結的後果就是對於殖民地市場的獨佔，對於原料來源和資本投資範圍的獨佔。所有這些加強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參差性而使爲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金融資本的「大強國」之間的鬭爭尖銳化。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發展到日益擴大的範圍。小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停止了，有的只是大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沒有大資本家競爭的地方，便在資本家「大王」及其政府的龐大組合之間展開着。地方的和一國的危機變成牽涉到幾國的危機而最後是世界的危機；地方的戰爭變成幾國的聯盟之間的戰爭而最後是世界的戰爭；階級鬥爭從少數集團的工人的孤立行動變成舉國的階級鬥爭而最後是世界無產階級對抗世界資產階級的國際鬥爭。最後，二個主要的革命力量組織起來對抗金融資本的已組織起來的力量——一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另一個是在外國資本壓迫下的犧牲品，即殖民地的人民大眾都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領導之下向前邁進着。

然而，這個基本的革命趨勢會暫時地停滯着由於下列各種事實。歐洲、北美和日本無產階級中的某些份子被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所賄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因害怕了革命運動而出賣了革命。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從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更高度地發展着技術，輸出資本到利潤率比較高的國家去等）和從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掠奪所得的收入中，能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因此也能從中提高他「自己的」工人的工資而使這些工人對於發展「國內」資本主義，和對於殖民地的掠奪，感到興趣而效忠於帝國主義國家。

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有計劃地賄賂工人階級，破壞民族革命運動，而與帝國主義列強妥協。所有這些只能一時地停滯革命危機的發展，最後分析起來，這些將加強帝國主義的壓迫，破壞民族資產階級在人民大眾之間的威信，使革命危機尖銳化，使人民大眾的土地革命爆發，而樹立了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內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建立為獨立和澈底的民族解放的有利條件。

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重分地球而起的帝國主義鬥爭爆發了第一次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戰爭動搖了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顯示了一般危機時期的開始。戰爭使交戰國的整個國民經濟脆弱而有力地打擊了國家資本主義。戰爭在廣大地域內增加了非生產的消費，毀滅了大量的生產工具和人的勞動力，覆亡了大量的人口而加於工人、農民和殖民地人民以不可計算的負擔。戰爭必然地加劇階級鬭爭而長成爲公開的革命的羣衆行動和內戰。帝國主義陣綫在最弱的一環破裂——沙皇的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大地主階級的專制統治。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剝削了剝削者，把地主和資本家的生產工具奪取過來。而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一個大國內建立和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個新的蘇維埃的國家形式是

奠下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

這個對於整個世界資本主義有力的打擊，階級鬭爭的尖銳化和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影響，便掀起了歐洲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和革命運動。

印度內西亞的暴動，印度的深入的騷動，和偉大的中國革命震撼了整個亞洲而是一個和同一的國際革命鎖鏈上的環鏈而又是資本主義深刻的一般危機的組成部分。國際革命的進行表現為無產階級專政而起的迫切鬭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以及殖民地暴動同着無數百萬農民的土地羣衆革命運動一起進行。因此，人類的絕對大多數投入革命的洪流了。世界歷史進入發展的新階段——一個延綿着的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時期。在這個進程上，世界經濟的聯繫表現於革命的國際性，但其不同部分的不一致的發展表現於各國的革命爆發在不同時期。

同時存在的帝國主義母國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對立是在高漲着。歐洲帝國主義的相對減弱是由於戰爭的結果，是由於資本主義在殖民地發展的結果，也是由於蘇聯的影響和離心的傾向顯現於第一個海上的殖民地帝國的结果。——大不列顛（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洲等）

由於這些便鼓動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偉大的中國革命喚起了幾萬萬中國人民的行動，而是帝國主義體系內一個巨大的裂痕。幾萬萬印度工農的不斷的革命騷動威脅了世界帝國主義的堡壘——大不列顛——的統治。拉丁美洲各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傾向的長成威脅了北美資本的擴展。因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的進展是使佔世界人口的絕對大多數與少數帝國主義列強的金融資本寡頭政治作戰，也表示了資本主義深刻的一般危機。即使在歐洲本身，當帝國主義已控制了很多小國，民族問題也是加劇資本主義，本質上矛盾的因素。

因此，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部分的穩定正在被在下列原因破壞着：第一，帝國主義國家互相間的對立和衝突；第二，殖民地國家廣大羣衆鬪爭的掀起；第三，帝國主義母國內革命無產階級的行動；而最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世界革命運動的領導。國際革命正在發展着。

對於這個革命，帝國主義也正在積聚力量。對於殖民地的遠征，一個新的世界戰爭，一個反蘇聯的戰爭，都是目前帝國主義政策的顯著形態。這必將引起國際革命力量的解放而引向帝國主義的必然崩潰。

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域，作爲偉大的工人階級事業的，工農聯盟的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邁進着的一個新的文化的領域，蘇聯必然的是所有被壓迫人民的世界運動的基礎，也是世界歷史上的最大因素。對於蘇聯，世界無產階級第一次得到一個真正是自己的祖國。在殖民地運動上，蘇聯是一個富有吸引力的有力中心。

在殖民地，尤其是任何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上，每個力量應用於分散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以發展成反帝的鬭爭，而組織一個革命行動以解脫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得到完全的獨立。

這樣地，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一般地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上湧現出來，尤其在帝國主義時代。整個地說來，資本主義制度正在達到其最後的崩潰，金融資本專政正在式微，而被無產階級專政所代替着。

(二) 無產階級專政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革命的過渡時期存在着，而在這個時期，資本主

義社會轉變爲共產主義社會。同樣地，也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存在着，而在這個時期，主要的國家形式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從世界帝國主義專政過渡到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展延着長時期的有着許多失敗的和勝利的無產階級鬭爭；長時期的有着資本主義關係的不斷的一般危機和社會革命的不斷的生長，亦即是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內戰；長時期的有着民族戰爭和殖民地革命，這在本身雖不是革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但在客觀上，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而構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長時期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時以「和平」關係和武裝衝突存在着；長時期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構成着；長時期的有着帝國主義國家反蘇維埃國家的戰爭；長時期的蘇維埃國家和殖民地之間的聯繫變爲更加密切；以及長時期的……

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是從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轉入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的和重要的先決條件。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在下列條件之下能建立起來：當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經在某個或某幾個國家內得到了；當新建立的無產階級國家與已存在的無產階級國家組成聯邦；當這樣的聯邦已生長着和擴展到殖民地來，而這已使殖民地從帝國主義束縛之下解放出來；當這許多聯邦已生長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世界聯邦而團結了整個人類在世界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組成一個國家。

在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上，第三國際這樣地規定着：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 一、不分種族，承認所有民族完全的自決權，亦即是包含有民族分立的自決權。
- 二、所有從帝國主義解放出來的民族爲與帝國主義作戰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有統一和集中軍事和經濟力量的自由權。
- 三、對限制和約束任何國家、民族、或種族的處置進行廣泛的和堅決的鬥爭。各民族各種族一律完全平等。
- 四、蘇維埃國家應盡可能地用一切方法保證和支持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的民族的固有民族文化，同時也應指導這種文化內容的發展而施行一種適當的無產階級政策。
- 五、應對於過去被壓迫的「領土」、「統治地」和「殖民地」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生長盡可能地扶植。這樣才能使它們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路線而對於完全的民族平等能奠下一個適當的基礎。

六、對一切狹義愛國主義，民族仇恨主義，種族偏見主義和其他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野蠻殘餘進行鬭爭。

在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些任務時，（指經濟政策——譯者）必須要牢記着下列的論點：

不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經濟落後的國家內，（那裏小資產階級羣衆佔人口中的大多數）存在着大量的小生產單位（首先是農民經濟，自耕農經濟，手工業者，小商人等）而且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中心（美國，德國，在某些程度內英國亦然）也是如此。因此，在發展的初期，須要在某些限度內的經濟的市場關係和貨幣制度等。經濟形式的多樣性（從社會主義的的大工業起直到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經濟）不得不起一切經濟形式的鬭爭；不得不起適合這種經濟形式的各階級和階級集團對於經濟活動的不同動機和經濟利益的鬭爭；最後也不得不在一切經濟生活的領域上，資產階級社會制度所遺留下來的習慣與傳統存在並且不能立即消除。所有這些都要求無產階級的經濟領導正確地把社會主義大工業和簡單的商品生產者的小經濟在市場關係的基礎上聯繫起來。就是說，這種聯繫要保證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作用同時也要保證基本農民羣衆的經

濟最大可能的發展。因此，散漫的小農勞動在全國經濟中的重要性愈大，則市場關係的範圍就愈廣。直接有計劃的領導的意義就愈小，而一般的經濟計劃就愈要根據原有的經濟關係的估計而決定。反之，小生產的重要性愈小，則社會化的勞動比例就愈大，集中的和社會化的生產手段就愈多，市場關係的範圍就愈小，有規律的經濟計劃的意義對無政府狀態比較之下就愈大，而生產和分配上有計劃的指導就愈顯著，愈廣泛。

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表現於一連串的在時間上和性質上不同的進程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而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民族解放戰爭，殖民地革命。只有作為革命進程的結果，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到來了。

條件和方法的多樣性將使無產階級專政在不同國家內勝利。

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中國，印度等）和附屬國內（阿根廷，巴西等）有着有時很發達的工業基礎——在大體上不適於獨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在經濟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只有着中世紀的封建關係或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關係。在這些地方，主要的工業商業，和銀行事業，主要

的運輸工具，龐大的陸上地產和農場等都集中在外國資本家集團的手中。在這些國家內的主要任務在於一方面與封建的和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作戰，而有計劃地發展農民的土地革命；在另一方面，則為求民族的獨立與外國帝國主義作戰。當作一個法則，在這些國家內，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經過一連串的預備階段才有可能，只有經過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時期的結果才有可能，而在大體上，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已建立起來的國家的直接支持之下才有可能。

在至今尚為更落後的國家內（如非洲的某幾處）沒有工資勞動者或是很少，居民中的大多數仍過着部落生活，原始的部落式的殘餘仍然存在，民族資產階級幾乎沒有，而外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主要表現就是軍事佔領和霸佔土地。因此，中心的任務在於為民族獨立而作戰。勝利的民族暴動能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而免除了資本主義階段，假如無產階級專政已建立起來的能國家給以真正的，有力的援助。

因此，當這個在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國家內無產階級正臨到奪取政權的迫切任務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蘇聯已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有世界意義的因素。——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正是以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存在的而會引起社會的發展，——雖然在這些國家內，社會

關係是不成熟的——假如能得到無產階級專政和一般的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援助和支持。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鬥爭的特殊性，必然的長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從這種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最後，鬥爭的民族形式的決定重要性，使這些國家內的黨有着一些特殊任務，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任務的預備階段。第三國際認為下列八點為這些任務的最重要者

- 一、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封建的統治者，和地主的官僚政治的統治。
- 二、在蘇維埃基礎上，建立工農民主專政。
- 三、完全的民族獨立和民族統一。
- 四、廢除國債。
- 五、帝國主義大企業（工業，運輸，銀行等）的國有化。
- 六、沒收地主，教堂，寺院的土地。所有土地的國有化。
- 七、八小時工作日制度的創立。
- 八、革命的工農軍隊的組織。

在無產階級是鬭爭的領導者和指揮者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

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其速度正與鬭爭的發展和其強烈性爲比例。（資產階級的怠工和沒收怠工的資產階級的企業必然地會擴大到整個大企業的國有化。）在沒有無產階級的殖民地上，帝國主義統治的推翻亦即含有人民（農民）蘇維埃的建立，和外國企業和土地的沒收和國有。

殖民地革命及民族解放運動在反帝國主義的鬭爭中，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鬭爭中，佔有十分重要的部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在過渡時期也是重要的，因爲代表了「世界農業區」正如工業國代表了「世界都市」。因此，組織社會主義的世界經濟的問題，適當地聯合工業和農業的問題，擴大地說來，也就是處理過去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關係的問題。由是，與殖民地上勞苦大眾兄弟似的和軍事上的聯盟，代表了世界工業無產階級，作爲反帝國主義鬭爭的領袖，必須實踐的主要任務之一。

這樣地，在喚起母國內的工人階級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鬭爭中世界革命的進展也喚起了無數百萬的殖民地工農的反帝國主義鬭爭。由於經濟力不斷增長的蘇維埃共和國作爲社會主義的中心而存在，從帝國主義解放出來的殖民地便在經濟上傾向於世界社會主義的工業中心並與之聯合起來，而被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洪流中，同時，由於跳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更進階段，作爲政治制度，也就獲得迅速的經濟和文化上進步的時機。過去落後殖民地上的農民蘇維埃，和過去比較進步的殖民地上的工農蘇維埃在政治上團結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心的周圍，參加逐漸生長的蘇維埃共

和國聯邦，而由是進入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統一制度。

社會主義，作為新的生產方法，也因此有了遍天下的發展範圍。

(三) 第三國際的戰略與策略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在為求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帝國主義的鬭爭中，革命的共產主義在工人階級中遇到不少的不良傾向。這或多或少地表現了無產階級在意識上作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奴隸；或在無產階級中反映了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這在有時雖能為求解脫金融資本的束縛而革命，但不能堅持和科學地計劃戰略與策略，或從事於以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鐵的紀律為基礎的有組織的鬭爭。

中國的孫逸仙主義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在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民」這個概念隱蔽了「階級」這一個概念；社會主義是被提出了，但並不作為一個特殊的生產方法被一個特殊的階級（無產階級）所實踐，而僅僅作為一個社會幸福的含糊解釋，同時反帝國主義的鬭爭和階級鬭爭的發展前途之間沒有聯繫。因此，在中國革命

的第一階段上，孫逸仙主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作為階級分化和革命更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孫逸仙主義就從革命發展的意識表現轉變為其更進一步發展的樞樞。

如像印度的甘地主義的傾向，完全染上了宗教的概念，和夢想了最落後的而在經濟上最反動的社會生活。社會問題的解決不是以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這些落後方式，宣傳不抵抗主義，和否定了階級鬭爭，同時在革命發展的進程中，甘地主義已轉變為公開的反動力量。甘地主義正在逐漸變為反對羣衆革命的意識。共產主義應有力地对之鬥爭。

正像甘地主義，加維主義過去是羣衆的意識，而現在已變成黑人羣衆革命的阻礙了。本來提倡黑人在社會上平等的加維主義後來却發展戰黑人的柴納主義。它不主張與美帝國主義作戰，而提出「回到非洲去」的口號。這種危險的意識不能產生一種最簡單的民主性而玩弄着一種不存在的「黑人王國」的貴族政治性，所以必須有力地加以抵制，因為這對於黑人羣衆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鬭爭上不是一個援助而是阻礙。

反對所有這些傾向的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國際革命工人階級的崇高意識與所有這些傾向首先是社會民主主義不同而與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教訓完全符合。這指導了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革命鬭爭，而在鬭爭中，適用於所有無產階級羣衆行動的方式。

爲了實踐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任務，共產黨必須首先完成下列基本的戰略任務：

與殖民地、半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革命鬥爭聯繫起來是第三國際在世界無產階級鬥爭中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殖民地鬥爭必須首先爭取殖民地上的廣大的工農大眾在革命的旗幟之下；但沒有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國家的勞苦大眾的最密切合作，這是不可能的。

當第三國際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之下，在所謂「文明國家」內組織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時，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如拉丁美洲）的每一個反帝運動；應宣傳反對狹義愛國主義的所有形式，和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於被奴役的大小民族和種族的虐待（虐待黑人和「黃色工人」反閃族等）以及支持其反對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的鬥爭。第三國際特別提出與在帝國主義佔有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所宣傳的狹義愛國主義鬥爭，同時也與其代理人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鬭爭；應經常地以蘇聯的實踐（各民族的親密和平等）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實踐對照起來。

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共產黨必須有系統地援助殖民地和一般的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解放運動。

有力地援助這些運動的責任主要地落在被壓迫國家經濟上，金融上或政治上依附的國家內的工人。共產黨必須公開地承認殖民地的分立權，和分立的宣傳權，亦即是宣傳殖民地解脫帝國主義國家而獨立，必須承認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武裝抵抗權（即暴動和革命的戰爭）而在可能範圍內必須給予這種抵抗以有力的援助。對於所有被壓迫民族，共產黨必須依從這個政策。

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內的共產黨必須執行勇敢的 and 堅持的反帝國主義的鬭爭；必須不斷地宣傳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階級的友誼和團結；必須公開地提出，宣傳，和實行土地革命的口號而喚起廣大的農民羣衆來推翻地主，而與僧侶，牧師，和其他類似份子的反動和中世紀式的勢力作戰。

在這些國家內，主要的任務在於獨立地組織工農（建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工會，農會，和農民委員會——在革命形勢之下，則組織蘇維埃等）使之脫離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暫時聯合僅在資產階級不妨礙工農的革命組織和真正地執行反帝國主義的鬭爭的條件之下才得爲之。

在反對壓迫殖民地人民的鬭爭中，共產黨應在殖民地提出部分的要求，這些要求應適合於各國的特殊情形。例如：一切民族和種族完全平等，取消外國人的一切特權，工農組織的自由，縮短工作

時間，禁止童工，取消高利貸的借款，降低與取消地租，減輕捐稅負擔，抗稅等等。一切這些部分的要求應服從於共產黨的下列的基本要求：國家的完全的政治獨立，驅逐帝國主義者，工農政府，土地屬於全體人民，八小時工作制度等。在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共產黨應進行從殖民地撤回帝國主義軍隊的宣傳運動，在海陸軍中擴大擁護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宣傳，動員羣衆去阻止軍隊與軍火的運輸，組織罷工及其他種種形式的羣衆反抗。

不像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每個支部服從其「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其自己的「祖國」的紀律）第三國際的各支部只是服從一個紀律即國際無產階級的紀律。這將保證世界工人爲世界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勝利。不像第二國際（分化工會，對殖民地人民作戰，與資產階級聯合）第三國際是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統一的組織，也是所有種族和民族的勞動者爲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統一的組織。

不願資產階級的令人血腥地恐怖，共產主義者勇敢地，熱情地在國際階級陣綫上所有崗位上作戰着；深信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必然的而決不能避免。

「共產主義者羞恥於把他們的意見和目的隱蔽起來。他們公開地宣佈，他們的目均只有強國

地推翻所有現存的社會條件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前發抖。無產者只要解脫他們的鎖鏈。他們有一個勝利的世界。

「萬國勞動者，聯合起來！」

（第三國際綱領）

附錄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

現階段的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無疑地由於下列各種事實已提到最高位上：帝國主義國家的集團主要地爲了重分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已互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火併着；賴着對於弱小民族的剝削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已是日暮途窮；作爲帝國主義生命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附屬國內的人民大眾已覺醒着爲解脫帝國主義的束縛而積極鬥爭；而最後，東方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首先是中國的革命給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以新的希望。

從全世界二十萬萬的人口，除了一萬五千萬在蘇聯以外，只有三萬五千萬在帝國主義國家內（這當然也包含了很大數字的反帝國主義的被壓迫階級），而大多數的十五萬萬是屬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同樣被壓迫的所謂中等國家內。顯然地，絕大多數人口的革命解放運動將很自然地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但這個責任主要地必須落在東方被壓迫民族和國家身上，那裏佔有十萬

萬以上的人口那裏是帝國主義國家主要的資源所在而供應了大量起決定作用的廉價勞動力，那裏是帝國主義在上昇期的養料而是在其崩潰的前夜期的毒藥。

在東方，中國是最富有進行革命解放運動的條件的國家。不僅在地理上佔有最優越的位置，而且作爲一個半殖民地是各個帝國主義逐鹿的場所。偉大的中國民族的覺醒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相互的矛盾使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同於一般殖民地革命。現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獨佔這個廣大的中國市場，這使其他帝國主義者爲了打破這個獨佔而援助中國，雖然在革命的進程中，帝國主義國家會停止這個援助而破壞之。作爲一個半殖民地，各個階層同樣地受到帝國主義的威脅而聯合起來，同時運用了半獨立國家的機能，也能比較一般殖民地更容易地掀起反帝的鬥爭，雖然在革命的進程中，階層的分化將不可避免地相對地減弱這個鬥爭。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很大的打擊，使它在兵力、財力、物力都遭到極大的困難，使日本國內政治的和經濟的危機繼續加深而使日本離開征服中國的幻想日益遼遠。現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差不多停止了積極的軍事進攻，它所要做的只是加強對於佔領區域收括，掃蕩這

些區域的中國遊擊部隊，而主要的是分化中國的內部團結。因而，現階段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事務日程上第一個就是內部團結的聯合戰線。所有中國人都深信着聯合戰線是中國革命的鎖鑰，而大家都熱切地注意着它的前途。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西班牙的反法西斯運動同樣地以聯合戰線為基礎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先驅，構成了弱小民族反帝鬥爭中最有力的部分。但西方的反法西斯運動由於歷史的和地理的條件所限制，國際帝國主義的出賣，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和退出聯合戰線而暫時失敗了。當然西班牙的反帝鬥爭在歷史的世界意義上，發展的前途上都是不可漠視的。這對於東方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是否有彷彿之處呢？回答是否定的。中國的歷史的和地理的條件絲毫沒有與西班牙相同之處。中國的民族團結二年以來已削弱了向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力量當然是不能和德意二國的法西力量相倫比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已有動搖也已或有退出聯合戰線的前途，但這是在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已大半俱備之下而發生的，這絲毫不同於西班牙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是運動暫時失敗的直接原因。

關於弱小民族的民族資產階級，總是值得費思的。他們同樣地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因此在

運動的開始，他們總是積極地參加，以便取得領導權。然而他們幻想用本階級的力量單獨地進行解放運動而避免運用全民族的力量。全民族力量的掘發和運用對於他們是一種威脅。固然他們的利益與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但他們的利益與全民族的利益同樣地也是一個很大的矛盾。當前一矛盾超過後一矛盾的時候，他們便為謀本身的利益而參加全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當後一矛盾超過前一矛盾時，那當是另一種前途了。

民族解放運動實際上也是民主運動。後者不能澈底實行，則前者的實行是不可能的。民主運動必然地把全民族各階層都捲入洪流。但各階層對民主運動的看法是不同的。民族資產階級只需惡不澈底的民主運動因而制定了口鼻不全的適合於本身利益的憲法。這種憲法絲毫沒有與全民族的利益相符合。因而它的實施也就落空。但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民族的事，全民族的一致奮起會不顧民族資產階級的停滯不前而把運動向前澈底推進。

能為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澈底奮鬥者只有佔全民族絕對大多數的工農大眾。若是工農大眾能達到這個勝利的力量不够，那末民族資產階級便要成為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的領導，且使

這革命帶着不徹底性和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若是工農大眾有足夠達到這個勝利的力量，那末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就會發展到更高階段去了。

現時中國二個政權已在形成着：一個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一個是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這二個政權代表着二種完全不同的階級立場，而相互結合着共同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是一個奇觀，完全不同所有以前的弱小民族解放運動。這只有經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二十年的奮鬥才有可能，只有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才有可能，只有在中國的優越的社會條件之下才有可能。

有人在懷疑着中國第二次苦迭韃發生的可能從而使民族解放運動失敗。顯然地，苦迭韃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退出革命和鎮壓革命。然而現時帝國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擴大着，這使他們不能如意地找到適當的國際資本的背景。現時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直接反帝國主義的，這個行為無疑地將使他們在廣大人民中失去政治威信而得不到支持。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的強固和對於中國民族運動的有力援助，使他們失去他們自己的勝利的信心。現時中國無產階級已有足夠力量進行獨立的政治路線和對於廣大人民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是和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第二次苦迭韃雖確實地有隨時發生的可能，但決不會使解放運動失敗。第二次苦迭韃的

資產階級的出路連過去那種半獨立狀態都不能維持而只有陷於一種可憐的境地聯合戰線將繼續存在而有一個新的內容——一個基於新的聯合戰線上的新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運動。

中國革命，作為世界革命運動的有力約一環將給全世界的弱小民族首先是東方的印度和南洋羣島以新的希望。中國革命，聯合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推動和勝利，將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起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制度那裝滿了炸藥的地雷上，引起那早已成熟的總的危機。這個危機，當它散佈到英國國境以外的時候，就會直接引起歐洲大陸上的政治革命。」